臺大歷史學報第 59 期
2017 年 6 月，頁 217-263

BIBLID1012-8514(2017)59pp.217-263
2016.5.9 收稿，2016.12.22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59.05

新中國外交初體驗——1950 年伍修權的紐約聯合國之行

蕭 道 中*

提 要

1950 年 8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訴，指韓戰爆發後美軍進入臺灣海峽的行動侵略中國領土、傷害中國主權。這一控訴經安理會排入議程，並依例邀請北京派員出席該項問題的討論。11 月 24 日，北京代表團一行 9 人，在團長伍修權（1908-1997）率領下飛抵紐約。這次行動是中國新政府成立後，其代表首次出現在聯合國舞台。北京代表團抵達紐約的時刻，正值東亞冷戰高峰；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半島作戰，聯合國軍遭遇重大挫敗，國際社會頗有與中國協商，以政治手段解決衝突的願望。伍修權的紐約行因此被視為是了解北京意圖、建立與北京關係的重要契機，廣受各方注意。代表團除了要在外交戰場上與「帝國主義」國家一較高下，還要利用聯合國的論壇，向世界傳達中國新政權的聲音。它既是新政府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亦為伍修權個人「深入敵境」的外交歷險。觀察此事件，可一窺韓戰期間的國際局勢與中共建政初期的外交特色。

關鍵詞：冷戰　聯合國　控美侵臺案　韓戰　伍修權

*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E-mail: 059080@mail.fju.edu.tw.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中共建政初期的外交與控美的意圖
二、北京代表團的組成與行程
三、在紐約的活動
四、歸程與在國內的迴響
結 語

前 言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下令美軍進入臺灣海峽巡弋，執行海峽中立的策略。杜氏同時又稱，對於臺灣的未來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1]美國的行動引致新建未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反應，[2]北京在多次發表反對聲明後，於 8 月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指美國侵略中國領土、傷害中國主權。這項控訴稍後獲安理會排入議程，該會並依例邀請北京派出代表參加討論。11 月 24 日，北京代表團一行 9 人，在團長伍修權的率領下飛抵美國紐約市。這是中國新政府成立後，其代表首次出現在聯合國的國際舞台。伍修權率團抵達紐約的時刻，正是亞洲冷戰的高潮；中國人民志願軍（以下簡稱志願軍）方於月前大舉進入朝鮮半島，對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發動大規模攻勢。由於國際間頗有與中國協商，以政治手段解決韓戰問題的願望，

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mbassador at Large (Jessup), 1950.06.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Kore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以下簡寫為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200-203.

2 為求簡潔，以下行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簡稱為北京，中華民國政府簡稱臺北，美國政府簡稱華盛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修權此行因而廣受各方注意，成為冷戰初期聯合國的重要事件。

伍修權出身軍旅，卻承擔這項歷史性的外交任務。此行除了在外交戰場上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一較高下，還要利用聯合國的論壇，向世界傳播中國新政府的主張，強調北京對臺灣的主權，可說既是新政權重要的外交挑戰，也是伍修權個人「深入敵境」的外交歷險。伍修權代表團在紐約引起的種種注目與猜測，又是中、美或是民主、共產異文化之間的文化碰撞。觀察這次行動，有助於理解中共建政初期的外交風貌，中共黨人的意識形態與世界觀如何影響其外交政策，以及韓戰初期聯合國政治的複雜面貌。

在學術回顧方面，由於這次行動具有的開創性與批判美帝的宣傳意義，中國大陸的外交史或黨史論述對此多有相當正面的評價。例如謝顯益主編的《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稱伍修權「以充分的事實和雄辯的說理，有力地控訴了美國對中國的侵略和對朝鮮的干涉」。[3]中共黨史作家趙禕楠則在紀念抗美援朝 60 週年的文章中，指伍修權此行「在國際上公開揭露了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的罪行，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新中國外交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4]筆者〈聯合國中的交鋒：1950 年中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案研究〉運用相關的各國檔案與聯合國文獻，由聯合國的角度分析這個案件的發展，為本文提供背景知識。[5]此外，描繪伍修權個人生平與其外交貢獻的文章頗多，具有一定的參考性。這類文獻的共同點是立場一致，對伍修權高度肯定，但幾乎都沒有注釋說明論述基礎，比較接近歷史演義的文學敘事方式，未臻學術研究標準。[6]在中文論述以外，Zhong Wenrui 於其研究韓

3 謝顯益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頁 49。

4 趙禕楠，〈朝鮮戰爭中新中國的重大外交活動〉，《黨史文苑（紀實版）》2010 年第 13 期（南昌），頁 15。

5 蕭道中，〈聯合國中的交鋒：1950 年中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5 期（2016 年 6 月，臺北），頁 139-183。

6 本文所引用這類歷史演義文獻，包括石功彬，〈外交奇才伍修權〉，《黨史天地》1995 年第 7 期（武漢），頁 26-28；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戰初期中國外交政策的碩士論文中，用「軍事外交冒險主義」（military-diplomatic adventurism）概括北京與莫斯科當時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用一章的篇幅處理伍修權代表團的活動為其例證。[7] Zhong 的論文提供中共建政初期對外政策的輪廓，但北京向安理會提案的訴求主要偏向自衛與宣傳性質，用冒險主義來定位伍修權的活動似乎未盡妥切；且論述重心雖在北京的決策過程，但分析仍以中、美已出版文獻與伍修權的回憶錄為主，並未運用北京外交部開放檔案與現有的各種檔案資料庫文件。最後，該文對伍修權在紐約的活動與冷戰初期聯合國政治的複雜情勢分析較少，對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在外交行動的影響的分析仍有未盡之處。在上述的研究基礎上，本文嘗試運用聯合國與各國官方檔案，配合回憶錄與報刊資料等文獻，回顧此一事件的歷程，並說明其歷史意義。

一、中共建政初期的外交與控美的意圖

（一）北京的對外政策與韓戰問題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成立，在外交上一方面採取「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策略，不承認自晚清以來簽訂的中外條約，要全面重建對外關係；另一方面又遵行親近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邊倒」策略，對西方國家多採懷疑與敵視態度，尤其是

《縱橫》1998 年第 8 期（北京），頁 14-20；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下）〉，《縱橫》1998 年第 9 期（北京），頁 33-36；翁明，〈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記伍修權外交生涯片段〉，《外交學院學報》1999 年第 2 期（北京），頁 20-29、97。其中參考較多的是盧弘的文章，盧弘是伍修權的女婿，長期擔任《解放軍報》編輯，也是中共黨史專家。盧文雖沒有註明資料來源，但揭示一些目前檔案與文件中未見的伍修權任務細節，有相當參考價值。

7 Wenrui Zhong, “Military-diplomatic Adventurism: 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1)”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2013), 其中第 2 章討論伍修權代表團的使命，見頁 47-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國被視為頭號敵人。[8]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在過往有相當變化，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為求發展，曾爭取美國的支持與援助，1944 年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並受到歡迎，代表雙方關係增溫。[9]但在抗戰勝利前後，中共對美國可能幫助國民黨、軍事介入內戰的關切大為增加，毛澤東（1893-1976）於 1945 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警告中國有可能成為美國的「半殖民地」。[10]而在 1946 年中國內戰全面爆發後，毛澤東有關「中間地帶」的構想逐漸成型；他將世界分成美國、蘇聯和美蘇之間的三個部分，將世界主要矛盾歸納為「美國反動派與世界人民對立，在中國也反映這種對立」，美國已成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首要敵人，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威脅。[11]在現實上，中共反美是因為美國確實擁有可能影響中國革命的能力。在意識形態上，這又反映中共對中國革命的一種自我認知，中國革命做為國際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順天下大勢的行動，美國與其代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不但不足畏，甚至要輕視它。毛澤東在 1947 年底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會議中，強調精神的解放，黨內隨即在 1948 年初展開大規模精神動員，其中反美教育（包括反對美國干涉、改變畏懼美國的精神狀態等）是主要內容。[12]

---

8 有關中國新政府成立初期對外政策概況，參考謝顯益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特別是第 1 章第 1 節，頁 1-40；王泰平，《新中國外交 50 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 1 至 3 章，頁 43-64。牛軍論述對北京外交政策的特色指出，新中國外交是與中國革命運動聯繫在一起的，基於對過往中國外交的徹底否定和深刻批判。見牛軍，〈新中國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徵〉，《歷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北京），頁 23-42。

9 于化民，〈中美關係史上特殊的一頁——中共領導人與延安美軍觀察組交往始末〉，《東岳論叢》27 卷 4 期（2006 年 7 月，濟南），頁 121-131。

10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轉引自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65。

11 毛澤東，〈要勝利就要搞好統一戰線〉，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 197。有關中共將美國視為首要敵人看法的發展，參見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頁 118-123、164。

12 有關「天下大勢」的觀點，以及毛澤東與中共黨內在 1948 年前後進行的反美教育運動，參考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頁 116、125-128。

臺灣大學圖書館

相較於對處理各國關係的保留態度，北京在對待國際組織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展現積極的企圖。新政府甫成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1898-1976）即致函聯合國祕書長，聲明北京乃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北無權代表中國。[13] 1950 年 1 月，北京在蘇聯的建議下，致電聯合國，要求驅逐「國民黨集團代表」，[14]繼而通知任命張聞天（1900-1976）為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著手籌組駐聯合國代表團人事。[15]北京的外交動作雖在國際間廣受注意，但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錯綜複雜，在中國內戰尚未結束、美國對華政策仍搖擺不定之際，一時難有決定，北京希望儘快加入聯合國的期待在 1950 上半年未能如願。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東亞國際局勢為之一變。杜魯門調派美軍協防大韓民國，海軍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執行「海峽中立化」策略。[16]為避免單邊軍事行動引來干預中國內政的批評，杜魯門同時提出臺灣島法律地位尚未確立的論點，主張臺灣地位應由未來對日和約或聯

13 〈周恩來總理致函聯合國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及秘書長復電〉1949.11.1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開放檔案》（以下簡稱《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011-01。

14 蘇聯提出的建議與毛澤東對此的指示，見〈維辛斯基關於與毛澤東談話情況的報告（1950 年 1 月 6 日）〉、〈毛澤東就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地位問題發表聲明事致周恩來併中共中央的電報（1950 年 1 月 7 日）〉，收入《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1949 年 10 月-1951 年 12 月》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1949 年 10 月-1951 年 12 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以下簡稱《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頁 97、99-100。北京給聯合國的電文，〈周恩來總理就國民黨政府無法代表中國事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并安理會及蘇、英、美、法等國〉1950.01.08，《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011-02。

15 莫斯科建議北京儘早將安理會代表人選通報聯大主席與聯合國秘書長，迫使其將問題提到具體日程，〈No 13806，維辛斯基與毛澤東會談紀要：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1950 年 1 月 13 日）〉，收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二卷（1949.3-1950.7）》（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4），頁 231-232。中國通告聯合國的電文，〈周恩來總理、李克農副外長分別就我任命張聞天為我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冀朝鼎為出席經社理事會代表致函聯合國及其復函〉1950.01.19-1950.02.02，《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011-03。

16 有關控訴案提出的事件發展，見蕭道中，〈聯合國中的交鋒〉第三節的說明，頁 149-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合國決定。北京堅決反對美國此舉，視之為對中國的侵略，但另一方面亦認為這是揭露美帝國主義真面目的良機。在中國內部仍有不少人對美國理想主義抱有幻想，畏懼其軍事實力，毛澤東於 6 月 28 日指出，「美國這樣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國主義面貌，這對於中國和亞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國對東亞的侵略只會促使中國與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對抗帝國主義與侵略者。[17]因此，美國侵略朝鮮與臺灣的題材，隨即發展為中共建政後第一波全國性反美政治運動的重心。[18]在此背景下，當莫斯科建議北京把握蘇聯代表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的時機，在聯合國採取進一步外交攻勢時，北京立即採取行動。[19]北京對美控訴是國內反美運動的延續，也是配合蘇聯在國際上發動的對美外交攻勢。毛澤東在 9 月的談話中提到，杜魯門派軍進入朝鮮與臺灣，將使美、英發生戰略分歧。[20]北京的控訴可以為美、英的分歧更添火藥，達到分化帝國主義國家的目的。

8 月 24 日，北京致函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違反《聯合國憲章》，侵害中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要求安理會「制裁美國政府武裝侵略中國領土的罪行並應立即採取措施，使美國自臺灣及其他屬於中國的領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部隊」。[21]這項聲明稍後與國內的抗美援朝運動相結合；10 月 26 日，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與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運動委員會在北京舉行聯席會議，決議將兩會合併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統一領導抗美援朝的社會動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第 1 卷，頁 159-160。

18 北京在 7 月推動全國性的反美宣傳，7 月 17 日展開「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週」等活動，見蕭道中，〈聯合國中的交鋒〉，頁 151。

19 〈維辛斯基致羅申的電報（1950 年 8 月 21 日）〉，《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頁 213。

20 〈No 20253，羅申致斯大林電：毛澤東談美國在朝鮮的意圖（1950 年 9 月 22 日）〉，收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三卷（1950.8-1951.8）》（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4），頁 62-63。

21 〈周恩來外長就美侵略台灣問題致聯合國電文及有關使館收到該電文複本的覆函〉1950.08.24-1950.09.09，《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025-01，頁 7。

臺灣大學藝術與人文中心版權所有

員與宣傳工作。該委員會立即在全國展開以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帝國主義為中心的「三視教育運動」，對美控訴案的發展成為三視運動的重要題材。[22]

北京的控訴案得到蘇聯代表馬立克（Yakov Malik, 1906-1980）的大力協助，他運用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優勢，優先處理此案。8 月 29 日，安理會第 492 次會議將〈侵臺案〉列入議程後，馬立克又要求依照議事規則與慣例，邀請北京代表與會。[23]安理會幾經討論，於 9 月底決議邀請北京出席會議，並將討論該案時間訂於 11 月中旬以後；[24]但在志願軍進入朝鮮半島作戰後，情勢又有變化。11 月初，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志願軍入朝後的新形勢，蘇聯再提邀請北京代表與會的提議並獲通過。不過安理會這次的邀請有條件限制，只允許北京參與聯合國軍統帥有關中共介入韓戰報告書的討論，這使得北京的受邀身分從「原告」變成「被告」。[25]北京徵詢莫斯科意見後，拒絕安理會此次邀請，但顯然北京未來在聯合國勢必要面對臺灣與朝鮮等重大問題的挑戰。[26]

---

22 田居儉，〈抗美援朝運動與「三視」教育〉，《高校理論戰線》2000 年第 12 期（北京），頁 19-24。

23 相關過程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492 次，1950.08.29》，頁 3-11，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50/408/81/img/N5040881.pdf?OpenElement（2016 年 4 月 18 日查詢）。在聯合國文件中，北京控訴案正式名稱為〈臺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Complaint of armed invasion of Taiwan [Formosa]，以下簡稱〈侵臺案〉）。

24 臺北動用否決權阻止安理會邀請北京代表出席，最終仍無法改變局勢，見蕭道中，〈聯合國中的交鋒〉第四節的討論。安理會第 87 號決議〈臺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見聯合國文獻中心網頁，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87(1950)（2014 年 12 月 12 日查詢）。

25《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520 次，1950.11.08》，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52/710/97/pdf/N5271097.pdf?OpenElement，p. 4（2016 年 4 月 18 日查詢）。

26 莫斯科建議北京拒絕安理會此次邀請，見〈No 00343,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關於中國出席安理會問題（1950 年 11 月 9 日）〉，收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三卷（1950.8-1951.8）》，頁 110-111；與〈220.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國出席安理會問題指示的決議，1950.11.09〉，收入沈志華主編，《朝鮮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圖書館藏書

（二）北京外交部與伍修權的背景

自 1947 年中共外事單位成立直至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共負責涉外事務的人員多不是傳統的職業外交官，而是由資深的黨員幹部搭配較年輕的外語翻譯人員組成。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隨新政府成立，周恩來擔任部長，司級以上主管皆為資歷深厚的黨或紅軍幹部，中階官員主要是建政前即參與外事工作的幹部，基層人員則多為具有外語能力的年輕大學畢業生。[27]伍修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軍職轉入外交工作的行列，擔任外交部第一任的蘇聯東歐司司長。

伍修權，1908 年出生，中學時即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後被中共中央送往剛成立的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學習，結束學業後被選入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軍事，是受到共黨重點栽培的青年人才。[28]結束學業後，伍修權曾在蘇聯紅軍擔任翻譯等職務，1931 年在中共遭遇國民黨軍事圍剿的危險時刻返國加入共軍。此後他參與內戰與抗戰，歷任多項軍政職務，官至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抗戰勝利後，伍修權因為俄文與軍事的背景被派往東北工作，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東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參謀長等職，學識與軍功兼具。在外事工作方面，伍修權除多年與蘇聯紅軍來往的工作經驗，1945 年他原獲指派與董必武（1886-1975）代表中共，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因故未能前往。抗戰勝利後，美國調解國共軍隊衝突期間，伍修權擔任軍事調處執行部長春分部中共方面首席代表，與國民黨及美方代表有過交手經驗。1949 年底擔任蘇聯東歐司司長後，馬上被周恩來徵召前往莫斯科，參加《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磋商工作與後續一系列經貿談判。充分的軍政、外事經驗與良好的蘇聯關係，可能是伍修權被賦予出使聯合

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618-619。

27 見中共外交元老凌青對外交部成立前後的觀察與回憶，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頁 64。

28 伍修權生平，參考石功彬，〈外交奇才伍修權〉，頁 26-28。另見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 35-65。

臺灣本國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重任的主要因素；在北京缺少足夠國際經驗的情況下，蘇聯的協助極為重要。[29]

二、北京代表團的組成與行程

（一）代表團的組成

從 10 月初北京收到聯合國秘書長的正式邀請，到 11 月 14 日代表團出發，外交部門進行相當緊湊的準備工作。10 月 23 日，北京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Trygve Lie, 1896-1968），通告北京代表團由 9 名成員組成，除團長伍修權、顧問喬冠華外，另有龔普生、安東、陳忠經（翹）、浦山、周硯、孫彪、王乃靜等 7 名助理人員。[30]其內部分工，用伍修權的話來概述：「我們一行九人，三三制，三人行李，三人機要，三人辦外交。」[31]從日後代表團在紐約的實際工作狀況來看，正式外交會談多由伍修權、喬冠華與龔普生出面，浦山擔任翻譯。喬冠華曾長期參與中共的宣傳與新聞工作，主持《新華日報》國際專欄，為周恩來外交事務上的得力助手，時任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與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周恩來兼任主任），是代表團最重要的智囊。[32]代表團成員資料見表一。

---

29 由於缺少足夠的文件佐證，中共中央對北京代表團人事決策的過程尚不清楚。盧弘曾指出，中共中央預見這項任務的艱鉅與重要性，希望派出既威嚴又有謀略的「武將」型人物前往紐約，周恩來因此向毛澤東推薦伍修權，毛欣然同意。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頁 14。

30 〈周外長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　我已任命伍修權為特派代表　出席安理會討論我控訴侵略臺灣案〉，《人民日報》（北京），1950 年 10 月 24 日，第 1 版。

31 〈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收於〈伍修權副部長出席安理會情況報告〉1951.01.10，《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064-01（以下簡稱〈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7。

32 羅銀勝，《喬冠華傳：紅色外交家的悲喜人生》（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頁 121-135。

臺灣大學圖書館

表一　1950 年北京代表團成員資料表

姓名	職務	單位職稱、主要學經歷與此行負責工作
伍修權	團長	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曾任軍事調處執行部長春分部首席代表。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步兵學校。
喬冠華	顧問	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與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亞洲司代司長。[33]德國圖賓根大學哲學博士。
龔普生	助理	外交部國際條約法律司副司長，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碩士。
安　東	助理	解放軍上校，曾任軍事調處執行部東北執行分部執行處處長。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對外聯絡處後，安東出任第一任處長。[34]
陳忠經（陳翹）	助理	前中共地下人員，長期潛伏在胡宗南麾下，獲胡保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管代表團對外聯絡，在紐約常與聯合國、美國機關聯繫。[35]
浦　山	助理	外交部情報司，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36]擔任翻譯。
周　硯	助理	曾任軍事調處執行部翻譯，西南聯大英文系學士。[37]擔任翻譯。
孫　彪	助理	機要報務。[38]
王乃靜	助理	機要報務。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第 3 冊，頁 552。

34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網頁，〈共和國將帥：安東〉條目，http://www.jb.mil.cn/jszt/jsrw/ghgys/shj/andong/（2014 年 12 月 10 日查詢）。

35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77。

36 陳良飛，〈浦山的選擇〉，《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2013 年 5 月 14 日，第 D04 版。

37 伍修權指出代表團以浦山與周硯為翻譯，並稱讚周硯英、俄文俱佳。伍曾與周硯在軍調部執行小組共事，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09-211、258。

38 孫彪與王乃靜資料，參見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頁 15。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由表一可見，代表團的組成基本反映中共建政後外交隊伍的狀況。9位成員都不是職業外交官，而是以老幹部搭配有外事工作或留學經驗者。由教育背景來看，5 位成員有留學經驗，除伍修權曾赴蘇聯學習，喬冠華留德，龔普生、陳忠經與浦山留學美國。浦山與周硯擔任翻譯，安東與陳忠經具有情報背景，可見代表團可能還負有某些秘密性質的任務。[39]不過如果以聯合國工作而言，9 人中只有龔普生稍具相關經驗，她留學美國期間參加過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活動，結識羅斯福夫人（Anna 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知名作家賽珍珠女士（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1973）等美國人士；並曾短暫參與聯合國社福組織工作，算是與美國社會較有接觸的成員。[40]代表團 3 位成員早年曾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又顯見這個單位對養成新一代北京外交工作人員具有重要意義。[41]

（二）行前準備與旅程

此次代表團的任務因事關廣泛的國際事務與朝鮮、臺灣等重大問題，行前準備工作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在中共建政初期，周恩來非常

39 盧弘以國際問題和「某一方面」的專家來描寫安東與陳忠經，見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頁 15。陳忠經除內戰期間擔任地下情報工作外，中共建政後，曾任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局副局長、代局長，及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副處長等對外文化工作，但其人事資料一直保留在情報系統的中共中央調查部，他回部後曾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參見〈陳忠經同志逝世〉，《人民日報》，2014 年 8 月 11 日，第 4 版。本文有關安東與陳忠經情報背景的資訊，蒙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員蔣華杰博士的指教。

40 美方評估是否與北京代表團接觸時，曾留意龔普生早年在美留學時的人脈網絡，見 "Proposed Approach to Chinese Communist Delegation Attending UNSC, Nov. 16, 1950," 引自 "312.002 Chinese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 1950," *Archives Unbound: Department of State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Collection*. 有關龔普生早年在美經歷，另可參考李同成，〈聯合國專家龔普生〉，收入李同成、蔡再杜主編，《中國外交官在北美、大洋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106-108。

41 王泰平在《新中國外交 50 年》亦提到軍調組的經驗對培養北京未來外交人員的重要性，見該書，頁 16。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

強調外交工的紀律性，並親自訂下規範，認為外交無小事，凡事需請示，外事幹部就是文職的解放軍。[42]代表團人事確定後，周恩來召見主要代表指示機宜，伍修權用「進行活動、宣傳自己、揭發敵人」歸納上級交付的任務，此行既要為北京爭正統，延續國內反美鬥爭，也是配合蘇聯對西方展開的外交攻勢。[43]周恩來要求代表團主要發言稿必須在國內寫就並經過審查，到聯合國後的具體行動則可由代表團相機行事。[44]外交部為撰寫文稿，特別組織任務編組，由喬冠華與張聞天負責起草。[45]這些發言稿稍後經毛澤東、周恩來修改、並經中共中央審查後確定。

代表團出發前，周恩來召集全體團員，指出此行對中國與世界的重大意義。他指示代表團在紐約發言的重點，應將反對美國侵略朝鮮、臺灣、中國，反對重新武裝日本，與要求美國撤軍、迅速締結對日和約以保證亞太和平安全等各項訴求聯繫起來。[46]周恩來提醒各員這次任務的艱鉅程度等於參加戰鬥，特別是代表團的動態已受到帝國主義國家高度關注，他要求代表團時時警覺保密，不能洩漏北京的意圖。[47]周恩來對代表團的兩次指示還可與同時期另一份外交部文件互為補充。外交部稍早在考慮參加 1950 年第五屆聯合國大會會議任務時，列出對聯合國外交的主要目標：一、譴責並暴露美帝的侵略行為；二、宣傳北京的和平政

42 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頁 65。

43 筆者在目前開放的檔案與年譜資料中未見周恩來最早的直接工作指示，此三項原則是伍修權在日後報告中提及，見〈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3。

44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56、258。

45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修訂版），頁 653-654；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頁 15。

46 這些指示說明北京對東亞問題的基本立場，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上冊，1950 年 11 月 26 日條，頁 100。

47 〈關於參加聯合國會代表團安全保密問題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1 月 23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頁 514；另參見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頁 15。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策，並配合蘇聯等兄弟國家對美鬥爭；三、驅逐臺北代表。[48]這三點內容與周恩來對伍修權代表團的指示基本一致，兩者都說明韓戰發生後，北京對聯合國工作的重點在取代臺北地位、對美外交鬥爭，而後者的重要性甚至更為優先。

11 月 14 日，伍修權一行在百餘人歡送下從北京出發，強大的使命感令代表團心情激動。[49]伍修權回憶當時的心情既興奮又沉重，因為：

> 我們就將代表著偉大的新中國和近五億已經站起來的人民。……直接同當時還是十分強大，不可一世的頭號帝國主義者進行針鋒相對的面對面鬥爭。[50]

這趟旅程在當時的政治與交通條件狀況下，是經莫斯科、布拉格、瑞士、倫敦，再轉赴紐約。從北京飛往莫斯科的第一段航程途中，即因天候耽誤，是在蘇聯的大力協助下，代表團方能順利抵達。

由於代表團缺少參加國際組織的外交經驗，此行有許多需要莫斯科協助的地方。11 月 18 日，伍修權與喬冠華在莫斯科拜會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 1909-1989）。談話重點集中在實務問題，伍修權詢問蘇方安理會進行的程序與議事規定，例如發言時間是否有限制、是否會受阻撓等問題，葛羅米柯除答覆外，還提醒伍修權在議場上應注意事項，與在紐約可能會遭遇的種種不便（例如沒有可以放心開會的地方），他允諾蘇聯駐紐約官員一定盡力協助。伍修權另就臺灣問題在安理會的可能發展與葛羅米柯交換意見，雙方都認為此事在安理會最終可能不會有任何決議，最後伍修權請蘇方幫忙預訂飛往布拉格的

48 〈關於向聯合國第五屆大會提出我代表團名單問題的意見〉，收入〈關於向聯合國第五屆大會提出中國代表團名單問題的意見及配合聯合國鬥爭的幾項工作匯報〉1950.08.20-12.02，《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105-04。

49 當天到機場送行者，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首席代表張聞天，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副主席彭真、常務委員彭澤民，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章漢夫與社會各界代表共一百多人，見〈出席安理會討論我控訴武裝侵台案　伍修權等昨起飛赴成功湖〉，《人民日報》，1950 年 11 月 15 日，第 1 版。

50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58-259。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庫

機票。[51]這些談話顯示北京當時對聯合國運作的了解有限，莫斯科則對此行給予充分協助的承諾。

11 月 20 日代表團由莫斯科飛抵布拉格，在當地為處理美國簽證手續停留 3 天。北京向聯合國交涉入美文件時，即已強調應獲外交人員待遇，但在布拉格，美方卻只發給代表團普通簽證，為此北京與聯合國秘書處又進行交涉始獲解決。[52]在等待期間，代表團邀請參加過聯合國會議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官員，介紹聯合國議事情況。23 日代表團由布拉格出發，經瑞士過境倫敦轉機。抵達倫敦時，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官員與各社會主義國家駐倫敦使節都在機場相迎，可見此行受到的重視。[53]在經過幾段交通轉折後，代表團終於在 11 月 24 日清晨抵達紐約。長途旅行的疲憊被激動的心情所掩蓋，當飛機飛臨紐約上空，伍修權鳥瞰地面的燈光：

> 我們清楚的意識到，這裡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歷史會記下這個日子的，……一架載有新中國的第一個出席聯合國會議代表團的飛機，在紐約機場著陸了。[54]

在機場，除了人數眾多的各家記者外，代表團一行還受到聯合國禮賓科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駐聯合國官員的歡迎，一些美國左派團體代表與群眾也自發性的前來迎接。[55]伍修權對在場記者發表簡短談話：他希望北京的控訴案能在安理會得到公正處理，因為這將有助於亞洲及太平洋

---

51 〈葛羅米柯關於與伍修權談話情況的報告（1950 年 11 月 19 日）〉，《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頁 239-241。

52 不過這樣的「意外」，原先就在北京的預判之中，相關情況見〈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頁 7。

53 〈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12。

54 抵達紐約當下，伍修權有非常強烈的歷史感，他在回憶錄中以相當長的篇幅記錄這個事件，見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60-262。

55 "Peiping Delegation to U. N. Arrives for Council Debate on Formosa; Nine-Member Mission Ends 10-Day Journey Half Way Around World-Korea is Considered Possible Topic,"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50, p.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和平與安全。他還表示中美兩國人民歷來存在著深厚友誼，願向愛好和平的美國人民致意。[56]發表公開談話後，代表團沒有回應記者任何提問，即分乘聯合國安排的 6 部車輛前往飯店。[57]

三、在紐約的活動

（一）聯合國議場中的交鋒

代表團抵達紐約後稍作休息，隨即展開正式的拜會行程。伍修權等 4 人首先前往聯合國總部拜會秘書長賴伊與伊朗籍大會主席安迪讓（Nasrollah Entezam, 1900-1980），就此行需要聯合國提供協助的事務性工作進行安排；[58]接著拜訪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刻意將訪問聯合國的行程放在前面，是要避免外界認為北京是莫斯科附庸的聯想。[59]在蘇聯代表團，伍修權與率團參加第五屆聯大的蘇聯外長維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 1883-1954）、安理會蘇聯代表馬立克共商後續議事策略。首先是安理會的開會時間，由於 12 月將由臺北代表蔣廷黻（1895-1965）擔任輪值安理會主席，北京希望盡快討論〈侵臺案〉，蘇聯方面立即表

56 〈我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代表抵達紐約時講話稿〉1950.11.01-11.30，《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007-02。相關報導見 “Chinese Reds Speaks Softly On Arrival,”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1950, p. 1; 〈我赴安理會特派代表團抵紐約　伍修權在機場發表講話　控訴武裝侵台案能夠得到公正的處理　將有助於亞洲及太平洋的和平與安全〉，《人民日報》，1950 年 11 月 26 日，第 1 版。

57 〈安理會主席突然召開會議　在匪幫嘍囉抵達成功湖報到後　討論所謂美侵臺灣及韓局問題　美表示決不與匪夥接觸〉，《中央日報》（臺北），1950 年 11 月 26 日，第 1 版。

58 “Chinese Reds Speaks Softly On Arrival,”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1950, p. 2.

59 〈伍副部長報告出席安理會情況，1951 年 1 月 17 日於軍情局〉，收於〈伍修權副部長出席安理會情況報告〉1951.01.10，《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064-01（以下簡稱〈伍副部長報告出席安理會情況，1951 年 1 月 17 日於軍情局〉，《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43。這個報告的紀錄原有一段「否則就會引起人家懷疑，說是否我們要聽蘇聯的話」的文字，但被劃掉。

臺灣大學圖書館

示會聯絡安理會主席召開會議。[60]伍修權還詢問，北京準備的發言稿對華盛頓與臺北多有嚴厲批評，對方是否可能在議場干擾。維辛斯基要伍修權不用擔心，稱馬立克會為他打開局面。蘇聯的全力支持令伍修權對未來的行動更有信心，因為「有老大哥的幫助我們就更有把握了」。[61]

11 月 24 日上午，馬立克利用聯大政治委員會（第一委員會，以下簡稱政委會）開始討論大會議程第 70 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美利堅合眾國侵略中國之控訴〉（以下簡稱〈侵中案〉）項目時，以安理會已曾通過類似邀請，同時北京代表已抵達紐約為由，建議政委會遵循先例，亦邀北京代表參加討論。當天下午，蘇聯的提案以 30：8 票通過，22 票棄權（包括美國在內）。[62]北京也立即致電聯合國，授權伍修權為參加政委會代表。[63]於是在蘇聯的協助下，11 月 27 日上午政委會第 407 次會議進行期間，伍修權首次踏入聯合國議場；但這第一次出場只有亮相，沒有發言。[64]伍修權在日後的報告中提到，他原想要發言，但出國前沒有預期到要參加政委會會議，臨時準備與聯繫的時間十分匆

60 周恩來指示，12 月蔣廷黻如不避任安理會輪值主席，代表團應拒絕出席，見〈關於出席聯大政治委員會事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頁 550-551。有關安理會開會時機，依據安理會《暫行議事規則》第 2 條，「主席經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國的請求，應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網頁，http://www.un.org/zh/sc/about/rules/chapter1.shtml（2015 年 1 月 15 日查詢）。

61 〈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15。

62 《聯合國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錄：第一委員會，各次會議簡要紀錄，第二卷，1950.11.14-1951.05.17》（紐約：聯合國，1951；以下簡稱《聯合國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錄》），第 405 次（1950.11.24），頁 298-304、第 406 次（1950.11.24），頁 304-307。11 月 25 日聯合國因紐約天候因素取消預定會議，26 日休假，政委會至 27 日（周一）才再集會。

63 〈周外長電覆聯合國秘書長　我已派代表出席政委會　討論控訴美國侵略中國案　政委會決定今日開始討論〉，《人民日報》，1950 年 11 月 27 日，頁 1。

64 《聯合國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錄》，第 407 次（1950.11.27），頁 308-310。由於美國的操作策略，〈侵中案〉在本次討論後即告暫停，本次出席成為伍修權此行唯一一次出席政委會會議。見蕭道中，〈聯合國中的交鋒〉，頁 168-169。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促，且不熟悉會議進行程序，再加上伍修權是在會議中途入場，連主席坐哪個位置都不確定，因此最後沒有發言。[65]雖然有這些情況帶來的一點困窘，伍修權出席政委會的行動吸引外界、特別是旅美華人的注意，許多好奇的群眾希望親睹伍修權的風采，紛紛前往議場旁聽。根據伍修權回憶，這些人包括華僑、學者，甚至有原國府駐紐約總領事宗維賢。[66]

27 日下午，安理會開始實體討論〈侵臺案〉與〈大韓民國遭受侵略的控訴〉，這是伍修權首次出席安理會，同時獲邀參加討論的還有南韓代表林秉稷。但當次會議為議程問題消耗了全部時間。馬立克一如維辛斯基之前的承諾，為伍修權在安理會的登場爭取最佳發言時機，他與安理會輪值主席（南斯拉夫籍）暨其他代表，為當次會議應由北京或華盛頓代表先發言進行冗長辯論。[67]由於誰先發言在形勢上占有先機，可以把對方打為「被告」，掌握議場優勢，因此馬立克寸步不讓。在經過近 3 個小時的辯論與表決後，仍依主席安排，由美國代表先發言。由於議事沒有進入實質討論階段，伍修權當天根本沒有發言機會，但一下午的會議經驗，讓他對安理會運作有了基本瞭解，對議事也較有頭緒。[68]

11 月 28 日，安理會召開第 527 次會議，上述兩案進入議事交鋒的高潮。伍修權於當次會議發表他此行最重要的一次演講，嚴詞批評美帝國主義歷來對東亞的野心與侵略，批評聯合國容留臺北的代表，而排斥共產中國。他向安理會提出三項建議：一、公開譴責並採具體步驟嚴厲

65 〈伍副部長報告出席安理會情況，1951 年 1 月 17 日於軍情局〉，《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44。

66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65-267。

67 安理會主席南斯拉夫代表以美國代表先登記發言為由，認定他具有優先權；蘇聯則強調該次會議是應蘇聯要求召開，而北京代表遠道而來，又是提告人，應該優先發言，雙方為此爭執不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525 次，1950.11.27》，頁 3-11，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54/349/52/pdf/N5434952.pdf?OpenElement（2016 年 4 月 18 日查詢）。

68 〈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裁美國侵略中國領土臺灣和武裝干涉朝鮮的罪行；二、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使美軍完全撤出臺灣，以保證太平洋與亞洲的和平；三、立即採取行動，使美國及其他外國軍隊一律撤出朝鮮，朝鮮內政由南北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以和平處理朝鮮問題。[69]這篇演講共兩萬多字，持續近兩個小時，強烈表現近代中國的苦難與新中國成立帶來的民族自豪感。伍修權的演講充滿民族情感，他自承當時：

> 嗓門很高、勁頭特足，不論是發言的內容，還是演說的聲音，都把會場給震動了，就像把中國人民憋了多年的氣，一下子吐出來了。[70]

這場演說無疑打動在場許多聽眾，龔普生認為這「兩個多小時訴說了中國人民一個世紀的冤屈」。[71]許多旁聽席上的華僑在演說結束後擠上前來與伍修權握手，伍修權感到：

> 當時我自己也相當激動，感到近 5 億中國人民是不會孤立的。即使在帝國主義者直接控制著的地方，我們的朋友也是數不勝數。[72]

北京原希望在 11 月 28 日發言後，還有機會在安理會「痛駁」美、英代表，但在聯合國軍於朝鮮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安理會成員更偏重討論南韓遭侵略案。[73]伍修權恪遵指令，在安理會討論南韓問題時，僅坐在旁聽席上表達北京拒絕參加討論的立場。只有為批評臺北代表蔣廷黻時，才坐上代表席次。伍修權諷刺蔣廷黻自稱代表中國，在會場卻以英文發言，並重申北京不承認在中、蘇代表缺席情況下，聯合國通過的各

69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527 次，1950.11.28》，頁 7-10，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52/711/69/pdf/N5271169.pdf?OpenElement（2016 年 4 月 18 日查詢）。

70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69。

71 轉引自翁明，〈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記伍修權外交生涯片段〉，頁 24。

72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68-269。

73 〈關於在聯大政治委員會發言方針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頁 574-577。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項決議。[74]因未具議場優勢，〈侵臺案〉的討論在 11 月 30 日即告一段落。最後表決時，蘇聯提出的兩個決議草案（其中一個由北京委託提出）都未獲通過，本案沒有達成任何決議。[75]由於北京早已表明不參加南韓遭侵略問題的討論，這項表決也意味著伍修權在安理會的活動已告一段落。[76]

接下來，周恩來原指示代表團將工作重心放在準備政委會〈侵中案〉的討論，但這個案子在 11 月 27 日以後即告停擺。[77] 12 月 5 日，大會總務委員會將美國等 6 國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鮮案〉排入大會議程，次日大會決議交政委會討論。[78]該案經政委會表決成為優先處理案件，實際排擠〈侵中案〉的議事空間。接著聯合國大會又於 12 月 15 日開始休會，這使伍修權在聯合國已沒有發揮的舞台。回

74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528 次，1950.11.29》，頁 5，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53/271/17/pdf/N5327117.pdf?OpenElement（2016 年 4 月 18 日查詢）。

75 兩個決議草案都要求美軍撤出臺灣，蘇聯的草案提到《開羅宣言》，北京的草案又將朝鮮問題加入，要求美國與其他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半島。而要刻意提出兩個草案，可能是北京要避免給人予蘇聯附庸的印象。相關發展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530 次，1950.11.30》，頁 9-11，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53/264/95/pdf/N5326495.pdf?OpenElement（2016 年 4 月 18 日查詢）。

76 〈侵臺案〉在安理會的實體討論由 11 月 27 日的第 525 次會議開始，至 11 月 30 日第 530 次會議結束，第 529 次會議僅進行翻譯宣讀，沒有任何討論。伍修權在第 527、528 與 530 次會議做了發言。

77 周恩來的指示，見〈關於出席聯大政治委員會事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1 月 26 日）〉、〈關於在聯大政治委員會發言方針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2 月 2、3 日）〉、〈關於應集中精力參加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控訴美國侵略中國案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2 月 7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頁 550-552、574-577、599-600。政委會擱置〈侵中案〉，見聯合國，《聯合國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錄》，第 408 次（1950.12.07），頁 312-316。

78 伍修權事前曾徵詢維辛斯基對該案的看法。伍表示 12 月 3 日接到外交部指示（該文件檔案中未見），北京應為原告、而非被告，因此他準備向北京請示是否參加該案討論。見〈維辛斯基關於與伍修權談話情況的報告（1950 年 12 月 5 日）〉，《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頁 264-265。另見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73。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國前，伍修權奉指示把握時間發動宣傳。16 日代表團在聯合國舉行新聞發布會，伍修權將原本為出席政委會準備的發言稿發送出去，其主旨一如他在安理會的發言，為「揭發帝國主義破壞世界和平的情況」，他除再次批評美國對中國與朝鮮的侵略，並感謝蘇聯對中國的協助。[79]

綜觀伍修權在聯合國議場的表現，其發言雖然對振奮中國國內民族主義、強化共產國家集團內部團結大有助益，但是對國際社會來說，卻傳達一種負面訊息。[80]伍修權對西方批評的論調與蘇聯幾乎一致，讓外界更加認定北京與莫斯科採用相同的外交與政治宣傳策略，本身並不具有外交主體性。[81]伍修權強勢的排外姿態，也多少使得一些國家感到失望，他們熱切的希望北京能向國際社會釋出友好訊息。

（二）議場外的外交

除了議場上的言論，伍修權此行更受期待的是議場外的外交聯繫。對西方國家來說，自中國新政府建立以來，其外交政策既神秘又令人難以捉摸；韓戰的發生與志願軍參戰，使國際社會更為關注北京立場。北京的外交姿態既難以親近，北京代表出席聯合國會議因此獲得高度矚目，各國期待有機會與北京就朝鮮問題直接對話。[82]

---

79 〈伍修權在成功湖發表重要談話〉，《人民日報》，1950 年 12 月 18 日，第 1 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音是應該被全世界聽到　伍修權在記者招待會分發莊嚴文件　支持蘇聯代表控美侵略我國的發言〉，《人民日報》，1950 年 12 月 19 日，第 1 版。

80 有關美國輿論對伍氏談話的看法，參見 “The Road To Paris,” *Time: The Weekly News Magazine* 56, no. 24 (December 11, 1950), pp. 31-37，引自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資料庫。

81 美國國務院內部對伍談話的看法，見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Lucius D. Battle,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by Mr. William J. Sheppar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iat, 1950.12.02,”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301-1305. 臺北駐美大使顧維鈞認為伍修權的演講全是宣傳，伍雖然用中文發言，傳達的實為克里姆林宮的觀點，見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 8 冊，頁 167；回憶錄還提到其他國家官員對此的類似看法，見頁 168、181。

82 聯合國當時瀰漫與北京溝通的氣氛。印度管道傳出的消息，稱北京有意與外界談朝鮮戰事，其代表團且得到與外界對話之授權，“From High Commissioner for the United

伍修權在紐約停留期間，正是志願軍入朝後展開一連串攻勢的關鍵時刻，原已迫近鴨綠江的聯合國部隊應變不及，屢遭敗績，由原先的主動進攻轉為全面撤退，等到伍修權返國的 12 月下旬，志願軍已迫近北緯 38 度線。面對美軍在二戰後遇到的最嚴重挫敗，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用「我們正面對一場全新的戰爭」來形容聯軍當時措手不及的景況。[83]戰場的失利與北京在安理會的強硬姿態，使美國必須重新評估東亞的整體局勢，杜魯門一度在 1950 年 11 月 30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考慮包括授權動用原子彈等所有手段，以達到朝鮮和平的目的。[84]朝鮮情勢升高，使得部分國家積極尋求解決危機的政治方案，英國首相艾德里（Clement Atlee, 1883-1967）為此前往華府。聯合國內則普遍希望直接聽到北京對世界局勢的說法。[85] 12 月 14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由印度領銜的 13 個亞非國家提案，要求在朝鮮立即停火，並依決議組成 3 人停戰委員會，聯名向北京呼籲停火。[86]聯合國與部分國

Kingdom, Delhi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No. 3231, 16th November, 1950," CS/3, DO133/24,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美國情治單位的評估也認為，針對朝鮮問題，北京有可能希望利用這次機會在聯合國外與各國達成某種協議，"Memorandum by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1950.11.24,"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220-1222.

83 "Commander in Chief, Far East (MacArthu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50.11.28,"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237-1238.

84 該次記者會內容，見 Harry S. Truman,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November 30, 1950.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3673（2015 年 10 月 25 日查詢）。

85 聯合國內當時的氣氛，參考 "Security Council Sits Today on Mao Charge Against U.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50, pp. 1-2; "Waiting for Lefty," *Time: The Weekly News Magazine* 56, no. 22 (November 27, 1950), p. 28，引自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資料庫。

86 大會討論與投票情況，見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Fifth Session, Official Records, 324th Plenary Meeting*, 1950.12.14, p. 660. 依決議，大會主席安迪讓指定加拿大及印度代表與其共組 3 人委員會，和共黨方面磋商停火事宜，見聯合國大會第 384 決議《三八四（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鮮事》（A/RES/384(V)），聯合國大會網頁，http://dacces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058/60/IMG/

臺灣本島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希望把握伍修權代表團在紐約的機會，嘗試與北京直接接觸，以釐清北京對朝鮮的真實意圖，期待通過政治手段與北京解決朝鮮半島的戰事，因而與伍修權進行多次會晤。[87]參考表二。

表二　1950 年伍修權在紐約期間與非共產國家官員會談狀況[88]

日期	時間	會談者	會談要點
11.24	下午(與賴伊會面約 40 分鐘）	賴伊、安迪讓	北京代表團首先拜會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與大會主席安迪讓，伍就代表團在美辦公、交通與生活等事務安排與賴伊磋商。[89]
12.01	11:00（進行約 1 小時）	印度駐安理會代表勞氏	伍首次接觸聯合國以外的非共產國家官員。勞氏（Sir Benegal Narsing Rau, 1887-1953）向伍提出討論停火協議的建議，伍要求有書面文件，並表示會回報勞氏意見。雙方約定 12 月 3 日晚宴。[90]
12.01	（進行約 1.5 小時）	賴伊	伍到聯合國紐約新總部大樓拜會賴伊，賴伊詢問伍與其他西方國家代表會談的意願，並表示願前往北京與中國領導人商討維護和平的方法，他請伍將此意轉達周恩來。

NR005860.pdf? OpenElemen-t（2015 年 11 月 15 日查詢）。

87 各國與北京聯繫的動機各有不同，除本文稍後會處理的英、印外，法國代表蕭韋爾（Jean Chauvel, 1897-1979）也曾向美方表示，法國外交部想瞭解北京對中南半島問題的態度，指示他與北京代表聯繫，但他以時機不宜為由，勸巴黎放棄這個念頭。見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1.29,”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255-1256.

88 由於缺少足夠的北京方面文件，表二主要以英、美外交文獻與報紙資料製作，會面狀況僅列官方外交活動。中方通常由伍修權、喬冠華、龔普生 3 人為代表，浦山擔任翻譯。

89 “Security Council Sits Today on Mao Charge Against U.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50, pp. 1-2; “Chinese Reds Speaks Softly on Arrival,”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1950, pp. 1-2.

90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1,” 與“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4,”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299, 1354-13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期	時間	會談者	會 談 要 點
			關於停火協議，伍修權提出三項明確而堅定的要求：1. 美國與其他國家軍隊從朝鮮撤出；2. 第七艦隊撤出臺灣海峽；3. 北京應得到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次。賴伊也向伍提出停火協議的草案，伍只同意轉達。[91]
12.03	傍晚	勞氏	勞氏提到將建議在聯合國組織委員會處理停火問題，並召集大國共議停火事宜，他邀請北京參與。伍修權強烈批評美國當權者，堅持美國意欲侵犯中國，僅表示會轉達勞氏意見。[92]
12.04	晚上	賴伊與5國代表	代表團應賴伊邀請，前往賴伊寓所晚宴。參加者包括勞氏、杰伯（Gladwyn Jebb, 1990-1996）、以色列外長、巴基斯坦外長、瑞典代表。5人都來自已承認北京的國家，賓客名單且獲得伍修權事先同意。晚宴談到中以關係、停火等問題。喬冠華嚴厲批評美國支持蔣中正與中國人民為敵，當杰伯與賴依稱第七艦隊在臺海對臺灣與大陸都具保護作用時，喬稱此為美國的謊言。[93]

91 賴伊對英、美官員說明該次談話內容，見 “From 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 No. 1915, 1 December, 1950,” FC10211/28, FO371/83309,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4,”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378-1379. 新聞報導見 “Indian Sees Wu of Red China, Thinks Peiping Wants Peac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 1950, pp. 1, 5.

92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4,”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354-1355.

93 當次晚宴的報導，見 “Private Talk Held With Chinese Red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 1950. 以色列外長對晚宴的說法，“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5,” 及瑞典代表對晚宴的描述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Henry S. Villard, Adviser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950.12.08,” 分別見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415-1417, 1466-14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期	時間	會談者	會 談 要 點
12.05	午宴	杰伯	杰伯勸說北京考慮以政治方式解決朝鮮問題，指政治就是創造可能的藝術，伍則指出朝鮮與臺灣問題不能分割，必須同時解決。[94]
12.09	上午	勞氏	勞氏詢問停火方案問題是否已得北京指示，伍表示尚無，但北京也急於見到這場由美國所造成的危機可以儘快結束。[95]
12.09	17:30	賴伊	賴伊詢問停火問題，伍的答覆跟給勞氏的一樣。賴伊問到如有機會可否直接與美方談，伍未接受。賴伊認為伍似乎奉命避免對聯合國的決議與未來行動作任何承諾。[96]
12.14	早上（進行約 1 小時）	賴伊	賴伊請中國同意國際難民機構（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探視戰俘，伍拒絕，稱中國政府與朝鮮的狀況並無關聯。賴伊建議伍能與聯合國停戰委員會溝通停火問題。伍表示，停火必須按照北京先前的訴求，外國軍隊必須先撤出，臺灣問題須與停火問題同時考慮。[97]

94 這次會談是伍修權應杰伯 11 月 27 日的邀約而舉行，伍最初受邀時未置可否，但伍 12 月 1 日與賴伊談話時突然提到他樂意接受杰伯之邀，才有這次會面。相關經過見 “From 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 No. 1862, 27th November, 1950,” FC10211/17, FO371/83308; “From 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 No. 1915, 1 December, 1950,” FC10211/28, FO371/83309. 杰伯報告會談狀況的第 1947 號電文原件在檔案中未見，此處是根據 “Record of a Meeting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Secretary with the French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at 10 Downing Street on Saturday, 2 December 1950,” 註釋 “Calendar to No. 85: i 5 Dec. 1950 Jebb-Wu” 對該電的摘述，見 Rohan Butler,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II,* vol. 4: *Korea June 1950 - April 1951*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6), p. 229.

95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9,”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490-1492.

96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9,”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494-1496.

97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14,”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546-1548.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數位資料庫

日期	時間	會談者	會 談 要 點
12.15	上午	勞氏	伍向勞氏表示，他不會與停火委員會見面，因為北京認為聯合國的停火決議是非法的。[98]
12.15		英國出席聯大代表團團長楊格[99]	楊格（Kenneth Younger, 1908-1976）至北京代表團下榻處拜訪伍修權，探詢朝鮮半島停火問題。伍仍堅持先決條件是美軍與其他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第七艦隊撤出臺海，他強調中國已是統一而強大的國家，各國不能對此視而不見，北京在聯合國的地位應得到承認。聯合國停火協議只是美國詭計，北京不會考慮聯合國的非法決議。[100]
12.15	傍晚	賴伊	伍向賴伊表達代表團將返國，請聯合國協助交通問題，另請賴伊安排 16 日下午 3 點舉行記者會。賴伊力勸伍修權多作停留，並與停火委員會見面，但伍拒絕。[101]
12.16		安迪讓	北京記者會後，賴伊緊急聯繫停火委員會成員與伍見面。伍原拒絕，但稍後同意與安迪讓以大會主席，而非停火委員會主席身分會晤。[102]

觀察表二，伍修權抵達紐約後的第一周，除因禮貌需要拜會聯合國秘書長與大會主席外，只與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來往；第二周以後才與印度及其他西方國家官員會晤。[103]儘管伍修權 11 月 28 日在安

98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16,” *FRUS 1950,* vol. 7, *Korea*, p. 1557.

99 楊格當時以代理外相的身分，率英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第五屆大會。

100 “From 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 No. 2047, 15th December, 1950,” FC10211/36, FO371/83309;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16,”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559-1560.

101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16,”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556-1557.

102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16,”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560-1561.

103 伍修權與共黨國家代表接觸的情況，除伍修權回憶錄與少數俄國文件提到外，目前並沒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理會發表措辭強硬的發言，在各次會面中，不論是賴伊或其他國家代表仍不斷向伍修權探詢北京參戰的意圖與朝鮮停火的政治條件，並希望說服伍能與停火委員會成員或其他西方國家代表見面，或與美國接觸。[104]對此，伍修權曾告訴維辛斯基，「他在紐約在各種條件下與其他各國代表進行的會晤的感覺，他們都非常渴望從伍那邊得到，與他在議場上強硬發言的不同立場」。[105]

在代表團行程中，印度與英國是最積極嘗試與北京建立聯繫的國家。印度自獨立以來，便自視為東亞的代言人，力爭於國際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共建政後，新德里擔任起北京與西方間傳話的橋樑，又是聯合國朝鮮停火案的主要推動者，因此印度駐安理會代表勞氏是非共產國家代表中，與伍修權接觸最多的官員。北京代表團抵達紐約當天，印度官員就在代表團下榻的飯店留言，表達希望會面的意願。[106]英國則為其在東亞的經濟利益，與避免韓戰擴大、美國過度捲入遠東事務，分散對歐洲關注的緣故，亦急切的希望加強與北京的關係。[107]當聯合國收到北京傳來的代表團名單後，英外交部遠東司立即調查伍修權的個人資料。[108]當北京通知其代表經布拉格過境倫敦的行程後，英國外交部與其

有其他官方文件可資參考。伍修權抵紐約後當地的外交氣氛，見 “Peiping Delegate Shuns Private Talks With Wes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1950, p. 2.

104 〈伍副部長報告出席安理會情況，1951 年 1 月 17 日於軍情局〉，《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69。

105 〈維辛斯基關於與伍修權談話情況的報告（1950 年 12 月 5 日）〉，《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頁 264-265。

106 “Security Council Sits Today on Mao Charge Against U.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50, pp. 1-2.

107 由於英、美對北京的政治態度不同，英國希望利用各種可能機會接觸北京，以避免華盛頓的強硬態度將北京與西方關係弄僵，把北京完全逼向莫斯科。英國希望聯合國延長對臺灣與朝鮮問題的討論，以尋求在紐約（不論是在議場內或外）與北京溝通的可能，“From 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 No. 1841, 24th November, 1950,” FC10211/12, FO371/83308.

108 英國政府掌握的伍修權背景資訊全來自蘇聯塔斯社（Tass）的報導，相較於英國過往對中國人事情報掌握的深度，這似乎也說明英國對中共人物的陌生，“Formosa: Wu Hsiu-Ch’uan and Ch’iao Kuan-Hua,” FC10211/2, FO371/83308.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駐布拉格、紐約兩地的外交官密切聯繫，討論伍修權過境倫敦時，是否可能與英國官員接觸。[109]英方的判斷是，就算北京可能希望避免官方接觸，英國仍應主動向中方表達提供各方面協助的意願，像是安排觀光行程等，以展現最大善意，只是這些發展「過境外交」的構想最終沒有實現。[110]等伍修權抵達紐約後，英國駐安理會代表杰伯亦嘗試與伍修權接觸。只是杰伯於 11 月 26 日向外交部報告，他爭取與伍修權建立私人聯繫的努力皆未見成效。[111] 27 日，安理會會議結束後，杰伯趨前與伍寒暄並邀約共進晚餐，但伍未置可否。[112]杰伯因此向美國駐安理會代表奧斯丁（Warren R. Austin, 1877-1962）抱怨，他認為伍修權顯然受到捷克或波蘭人以保鏢（body-guards）身分密切監管（closely watched and shepherded）。[113]在杰伯與伍修權一起出席賴伊寓所的晚宴後，雙方才有進一步接觸。

作為聯合國軍的主力，美國對於這些場外會談並未表現積極的態度。雖然伍修權在回憶錄中指出，美國基於政策需要，想利用這次機會跟北京進行某種外交接觸與試探。[114]但從美方文件來看，華盛頓當時雖不反對與北京建立聯繫的可能，但基於之前與北京建立關係的失敗經

109 “Minutes, 20th November, 1950,” FC10211/13, FO371/83308. 英方的評估原認為北京應有興趣與外界討論朝鮮半島問題，所以會有意願與英方接觸，“Minutes, 25th November, 1950,” FC10211/11, FO371/83308.

1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Prague, No. 485, 20th November, 1950,” FC10211/3, FO371 /83308.

111 “From 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 No. 1856, 26th November, 1950,” FC10211/14, FO371/83308.

112 杰伯認為北京方面可能沒有授權伍進行場外協商，“From New York to Foreign Office, No. 1862, 27th November, 1950,” FC10211/17, FO371/83308.

113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1.29,”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255-1257. 從文件來看，英國與英國協國家特別有一種看法，認為莫斯科企圖孤立北京，使其不能與西方國家發展正常外交關係，例如以下加拿大的看法，“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ternal Affairs, Canada, Ottawa, August, 15, 1950,” 引自 “Top Secret, 1950 Formosa (Aug-Dec),” *Archives Unbound: Department of State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Collection.*

114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56-257，這個觀點在一些其他著作中也可見。

臺灣大學學術研究計畫

驗，美方僅以「試試也沒有損失」（it will do no harm to try）的消極態度面對，以旁觀的立場自許。[115]美國官員雖然密切關注勞氏或賴伊等人與伍修權的接觸，請他們向北京傳達，如果北京有意、雙方可以直接會談的意願。[116]但美方並未自行建立與伍修權聯繫的管道，也不斷提醒勞氏，華盛頓雖願聽取北京意見，但美方沒有停火方案，也未授權或鼓勵別人提出。[117]美方的消極係出於政治判斷，在伍修權於安理會的嚴厲發言後，華盛頓的決策官員益加認定北京僅是莫斯科的附庸。杜魯門在 11 月 30 日的聲明中提到：

> 有些人曾經希望通過聯合國提供正當的、和平的途徑和中國共產黨目前在成功湖的代表順利進行討論和談判。然而，看不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願意進行這種討論和談判的表示。他們避而不談實際問題，卻仿效蘇聯代表為了阻止安全理事會的行動所採取的慣伎，對聯合國進行猛烈抨擊，假話連篇。[118]

國務院內部討論則認為，過去曾對莫斯科與北京表達和平與來往的意願，但最終都被否定。聯合國如在此時提出停火斡旋，只會助長共產集團的侵略氣焰；就算要協商戰事，討論重點應放在莫斯科，而不是急著

115 在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華盛頓原以印度作為與北京聯繫的間接管道，美駐印大使曾被授權與北京駐印大使聯繫，但沒有實際進展。美國國務院因此認為北京無意與美方直接聯繫，因而未積極嘗試建立聯繫管道。相關發展見 "Advisability of Contacts with Chinese Communist Representatives Scheduled to Appear Before the UN, Oct. 26, 1950;" 「試試也沒有損失」的看法見 "Contacts with Chinese Communist Delegation at Lake Success, Nov. 22, 1950." 兩份文件皆引自 "312.002 Chinese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 1949-50," *Archives Unbound: Department of State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Collection*.

116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1.29,"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255-1257.

117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9,"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492-1493.

118 杜魯門記者會全文，Harry S. Truman,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November 30, 1950. 中文翻譯參考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下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頁 489-490。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北京聯繫。[119]

另一方面，這些會談也提供外界貼近觀察北京代表團的機會。不同的西方官員與伍修權私下接觸後，都認為他是堅定執行上級任務、少有個人意志的軍人，其對外態度在公私場合基本沒有差別。[120]而喬冠華則被認為是代表團真正的「腦袋」，他表現良好的教養，會面時能主導談話議題。相對的，伍修權在回應其他代表提問前，幾乎都要先以中文與喬冠華商量，顯示喬冠華在這次任務中的重要性。[121]

儘管各方對北京有所期待，但北京對朝鮮停戰的立場早已定調。北京與莫斯科皆認為美國已因戰場失敗與盟友分歧而陷入困境，各種停火提議只是美國為挽回敗局的緩兵之計。[122]不過，為避免在停戰問題上處

11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Lucius D. Battle,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by Mr. William J. Sheppar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iat, 1950.12.02,"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301-1305. 當時華府決策圈對蘇聯與中共的整體看法，可參見杜魯門對 1950 年底美、英高層官員會晤的回憶，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下冊，特別是第 25 章的內容，頁 496-519。

120 瑞典是最早承認北京的歐洲國家之一，其代表在安理會一直支持邀請北京參與聯合國會議，但在與伍修權接觸後，認為伍修權只是莫斯科的傳聲筒，完全按照黨的路線行事而沒有個人意志，"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Henry S. Villard, Adviser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950.12.08," *FRUS 1950,* vol. 7, *Korea*, p. 1467. 杰伯認為伍修權基本是軍人，而且表裡一致，"Jebb to Foreign Office, No. 50(516/82/50P), 28th December, 1950," FC1025/2, FO371/92229.

121 以色列外長提到，在賴伊的晚宴後，伍修權主要是與賴伊的女眷跟其他女賓談話，喬冠華才是與其他代表交流的主角，"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5," *FRUS 1950,* vol. 7, *Korea*, pp. 1415-1416. 勞氏稱喬是代表團的「腦袋」，見"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50.12.04," *FRUS 1950,* vol. 7, *Korea*, p. 1394. 杰伯也對喬冠華有正面評價，"Jebb to Foreign Office, No. 50(516/82/50P), 28th December, 1950," FC1025/2, FO371/92229.

122 中、蘇對美國情況的判斷，見〈No 00361, 葛羅米柯與王稼祥會談紀要：徵求蘇聯對和談的意見（1950 年 12 月 4 日）〉、〈No 00365,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關於停戰問題的指示（1950 年 12 月 7 日）〉，收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三卷（1950.8-1951.8）》，頁 145-146、1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被動，北京展現積極性，草擬自己版本的停戰條件並獲得莫斯科支持，其內容包括：一、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二、美國軍隊撤出臺灣海峽和臺灣島；三、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四、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中正的代表；五、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123]這五點本為北京對聯合國外交希望達成的目標，但先撤軍再談判的要求，與聯合國方面先停火再談判的訴求相左；北京認定東亞危機的源頭就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聯合國受到操縱，已成為侵略的幫兇。[124]周恩來電告代表團應變機宜，指美軍在前線慘敗，

> 英、法甚怕牽入對中國作戰，故急。……此時他急我不急，你們應採取攻勢，凡遇以朝鮮停戰為言者，你們都不要拒絕談判，你們應答以只要美軍從朝鮮撤退，朝戰自停，並且願將他們意見向北京做報告。[125]

對聯合國大會成立停火委員會的決議，北京維持一貫立場，認為在中國代表權問題未解決、北京代表缺席的情況下，成立停火委員會的決議非法而無效，周恩來聲明北京「不準備與上述這個非法的『三人委員會』進行任何接觸」。[126]北京要利用這些會談「證明美帝侵朝侵臺、聯合國決議為非法、聯合國不讓我國參加為無視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

123 〈No 00363, 羅申致莫斯科電：中國政府關於停止在朝鮮軍事行動的條件（1950 年 12 月 7 日）〉、〈No 00364, 葛羅米柯致羅申電：蘇聯同意中國政府停止軍事行動的條件（1950 年 12 月 7 日）〉，收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三卷（1950.8-1951.8）》，頁 151-153。

124 有關中國對聯合國朝鮮停戰問題的應對，可參考沈志華，〈試論 1951 年初中國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的決策〉，《外交評論》2010 年第 4 期（北京），頁 105-126。沈志華認為，志願軍入朝初期的勝利令毛澤東過於大意，錯估雙方實力，因此拒絕聯合國建議，錯失停火契機。

125 〈關於在聯大政治委員會發言方針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2 月 2、3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頁 575。

126 〈關於聯大通過「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決議的聲明（1950 年 12 月 22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頁 684-690。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民」。[127]可以說，與非共國家代表的接觸只是一種策略，北京雖然同意進行會晤，口頭上表示希望戰事和平解決；但它主要是利用這些場合擴大宣傳攻勢，加強分化西方。對於停戰，北京除堅持將朝鮮與臺灣問題綁在一起、外軍先撤出朝鮮與臺海再談停火的立場外，沒有任何轉圜餘地。因此伍修權雖然曾與他國代表就停戰問題交換意見，但沒有達成任何實際成果。[128]

對於要如何應對那些「資本主義國家人物」，伍修權在出發前就已做好準備，他借用魯迅的話：「『橫眉怒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對普通百姓客氣，對官員以牙還牙。」[129]伍修權在紐約接觸最多的非共國家官員，是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與印度代表勞氏，他另外對英國代表杰伯，與帶領英國代表團參加第五屆聯大會議的英代理外交大臣（Acting Foreign Secretary）楊格有較多印象。[130]伍修權認為賴伊對代表團既拉攏又威脅，是老奸巨猾的政客；印度代表勞氏相當笨拙，總是為英美的立場辯護。[131]楊格、杰伯則沉穩而有經驗，伍對其評價較高；儘管伍自認對他們並不客氣，但他們還是從國家利益的立場，表達倫敦願與北京發

127 〈關於在聯大政治委員會發言方針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2 月 2、3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頁 574-577。

128 「拖而不攤」是莫斯科與北京對停火問題的共同立場，見〈關於與蘇方商談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談判原則問題給毛澤東等的信（1950 年 12 月 8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頁 606；周恩來就會談問題給伍修權的指示，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冊，1950 年 12 月 14 日、1950 年 12 月 16 日條，頁 106-107。

129 〈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7。

130 北京代表團抵達紐約後，蘇聯、波蘭與捷克等國代表於 11 月 26 日設宴歡迎。而除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以外，伍修權認為有實際接觸官員僅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與印、英駐安理會代表，見〈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15、28。

131 〈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展更好關係的期望。[132]驕傲與不客氣是北京代表團此行面對西方的一種主要態度，伍修權返國後在他的報告多次提到此點。他表示在與西方官員接觸時，

> 我們和他們每次談話，語氣雖客氣，但我們是高傲的。凡是想見中國代表的都告以時間緊湊，都是約彼等到旅社來，印、英皆如此。[133]

這種驕傲當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從內戰到建國歷程中革命民族主義的高度發揚。[134]伍修權來到紐約時，就負有一種表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強烈使命與自豪感。志願軍在朝鮮半島上的成功攻勢更給予代表團無比信心，軍事與外交雙頭並進，在這帝國主義的核心地區，

> 我們痛罵了人家，這可以說百年來中國的屈辱外交翻了過身，過去外國人都可以騎在我們中國人民的頭上，現在全世界對我們的態度全變了。[135]

這種驕傲也表現在代表團的生活與行動中；北京代表團此次下榻在紐約曼哈頓最豪華的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大飯店（Waldorf-Astoria Hotel），使用了 9 樓幾乎一半的空間。[136]伍修權對代表團公務上接觸到的一般美國市民，包括紐約市派來的警衛、聯合國職員或是飯店服務人員都慷慨

132 〈伍副部長報告出席安理會情況，1951 年 1 月 17 日於軍情局〉，《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65。

133 〈伍副部長報告出席安理會情況，1951 年 1 月 17 日於軍情局〉，《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59。

134 根據牛軍的分析，內戰期間中共革命民族主義邁向高峰時，其政治動員和宣傳的關鍵字就是「不怕」這兩個字。毛澤東稱美國是「紙老虎」，並在黨與軍隊中推動不怕美國的反美精神動員，這些宣傳與教育活動極大的改變共軍的精神狀態，提升士氣。見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頁 125-128。伍修權代表團在美表現的驕傲與不客氣正是這種革命民族主義的延續表現。

135 〈伍副部長報告出席安理會情況，1951 年 1 月 17 日於軍情局〉，《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58。

136 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頁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致送禮物或是高額小費。[137]這一切作為，都要給人一種「新中國」的強烈印象。

（三）其他活動

除了與各方官員往來，伍修權在紐約還受到一些美國左派社團代表與其他「進步人士」的歡迎，他們致贈的花卉讓代表團在紐約的住處一片芳香，代表團與他們也有所來往。例如黑人歌手、演員羅伯遜（Paul Robeson, 1898-1976）是代表團中龔普生的舊識，龔曾前往拜訪。伍修權認為與「一般美國人民」接觸，可以了解美國社會的實貌，代表團也利用與華僑往來的各種機會進行「教育」，並可能成功吸引一些人士日後返回中國大陸。[138]同時，北京代表團在紐約各種活動始終得到新聞界的廣泛關注，也引來許多一般美國人民的好奇。4 名紐約市警察 24 小時保護伍修權等人的安全（北京認為其中也有監視成分），他們除了經常要為代表團擋開大批記者，有時也要回應一些古怪的問題，例如有人好奇，中國代表是否在地板上睡覺？是否會使用刀叉？[139]

代表團還吸引一些其他訪客，主要是美國商界人士，包括推銷員與生意人，他們希望有機會與中國大陸做生意。經貿活動雖不是此行目的，不過代表團透過這些商人，也順便採購一些物品，例如有些書刊與百科全書在中國國內少見，伍修權在喬冠華與浦山的建議下，運用代表團經費購買多部。[140]而在會議空檔，伍修權除獲邀參觀聯合國新大樓的設施，聯合國工作人員與負責維安的紐約警察也帶代表團遊歷紐約市區，參觀

137 代表團給兩位聯合國派來服務的司機各百元美金小費，這是很大一筆金額，見〈伍匪等九人　離美飛英　帶了一噸多的貨物　發表聲明學語蘇俄〉，《中央日報》，1950 年 12 月 21 日，第 2 版。

138 伍修權提到受他影響回國的包括聯合國的華語譯員、華籍職員等，見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72-273、276。

139 “Wu of China: ‘More General Than Diploma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50, pp. 12, 25.

140 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下）〉，頁 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摩天大樓與一些新建設，算是伍修權此行比較輕鬆的活動。[141]

代表團在美期間嚴守出國前擬定的工作紀律，對外除公開發言外，團員對記者的各種提問皆守口如瓶。[142]在飯店裡，代表團全體人員除非任務不得自行外出，三餐都由服務人員送到房間。主要成員外出開會或參加其他活動時，擔任機要報務的內勤人員則留守保衛，任何情況下不得擅自離開。因此孫彪與王乃靜在紐約近一個月時間基本足不出戶，只透過房間窗戶見識美國。[143]代表團在紐約為因應情勢發展，內部每天進行多次會議，有的發言稿是到紐約後才匆忙寫就，必須傳回北京審查，修改後的文稿必須日夜加班翻譯與打印，工作量極大。[144]早在代表團出發前，中國 vs 西方、共產主義 vs 帝國主義的觀念已深植伍修權等人的世界觀中，這種敵對的意識激勵著代表團在紐約的活動，但也為彼此交流帶來無形的阻礙。

四、歸程與在國內的迴響

（一）代表團返國

由於〈侵臺案〉在安理會的討論已經結束，第五屆聯合國大會的議程也已告一段落，北京既無意與西方續談朝鮮停火問題，代表團在近一個月的紐約活動後，工作邁向尾聲。[145]

12 月 19 日，北京代表團在馬立克與波蘭、捷克駐聯合國官員的歡送下離開紐約，踏上歸途。伍修權行前在機場發表聲明，這項聲明不同

141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75-276。

142 〈安理會主席突然召開會議　在匪幫嘍囉抵達成功湖報到後　討論所謂美侵臺灣及韓局問題　美表示決不與匪夥接觸〉，《中央日報》，1950 年 11 月 26 日，第 1 版。

143 盧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頁 16。

144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76。

145 周恩來指示代表團召開記者會與返國時間，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冊，1950 年 12 月 12 日條，頁 105。

臺灣大學藝術與社會研究所

於他在聯合國批判帝國主義的尖銳論調，改以軟性的方式向美國人民訴諸和平的願望。伍祝賀美國人民聖誕節與新年快樂，強調此次北京代表團是為東亞和平而來，唯有美國軍隊撤出朝鮮與臺灣才能制止戰爭，達到真正的停火；聯合國內正在推動的停火協議，只是為延緩美國失敗的陰謀詭計。伍修權呼籲美國人民辨別是非，不為少數戰爭販子所矇騙。[146]這篇聲明與伍修權初到紐約機場的講話首尾呼應，都是把美國人民與政府區分開來，以爭取輿論的支持。

代表團回國時，帶走了超過 1 公噸的行李，包括書籍、報刊、攝影裝備、衣物、電器與小型家具等「對國內有用的東西」，為此另外支付 1,600 多美金的航空貨運費用。[147]雖然蒐集「美帝」資訊不在代表團行前的任務指示中，但不論是出於認識敵人或純粹的好奇，北京對美國的科技與社會是有相當興趣的。

12 月 20 日，代表團在倫敦轉機時仍把握時間，再向新聞界發表聲明。除重申伍修權在紐約的言論外，特別呼籲歐洲人民，勿受美帝國主義拖累，陷入一場新的戰爭。[148]經過一個半月的行程後，伍修權代表團

146 〈伍修權向美英報界分別發表聲明　揭露美帝主張在朝鮮「首先停火」別有用心　強調只有停止侵略戰爭才能真正停止戰火〉，《人民日報》，1950 年 12 月 22 日，頁 1。

147 在檔案中並未見到代表團行李清單，貨物品項資訊來自伍修權回憶與當時新聞報導。伍修權提到購買多部百科全書，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75。以下幾則新聞報導則提到部分貨物品項，“Wu Flies For Home After Accusing U. 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1950, pp. 1, 5; “Peace Only On Peking’s Terms: Mr. Wu Leaves U.S.,”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December 20, 1950, p. 5; “Red China Envoy Leaves; Blasts U. N. Truce Plan,” *Chicago Daily Tribune*, December 20, 1950, p. 16; 〈伍匪等九人　離美飛英帶了一噸多的貨物　發表聲明學語蘇俄〉，《中央日報》，1950 年 12 月 21 日，第 2 版。此外《中央日報》根據美國電視界的消息，報導伍修權此行帶回大量「奢侈品」，然因中國沒有收訊，其中 3 部電視機無法使用，顯見代表團可能帶了不少電器回國研究，見〈伍匪修權愚不可及　在美購回電視機　結果都變成廢物〉，《中央日報》，1951 年 3 月 23 日，第 3 版。

148 周恩來對伍修權倫敦聲明的指示，見〈關於招待記者談話稿的修改意見給伍修權等的電報（1950 年 12 月 14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頁 642-644；報紙對伍修權在倫敦的報導，見 “China Anxious To Find Solution: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於 12 月 30 日返抵北京。政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主席郭沫若（1892-1978）到場致歡迎辭，他高度稱讚伍修權此行一如志願軍在戰場上的成功，將美國與其僕從國的外交陣線打得落花流水。伍修權則在群眾歡呼口號中回顧在美奮鬥的過程。他表示新中國的控訴案雖在美國操縱下沒有結果，但「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認為我們的控訴不僅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呼聲，而且也是代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呼聲」。[149]代表團稍後又向劉少奇（1898-1969）與周恩來彙報並獲得讚揚，劉少奇指示廣為宣傳此次行動。[150]從當時中國國內報導此事件的熱烈氣氛，反映人們對共產事業在中國發展的信心與熱情。

（二）紐約任務的迴響

在抗美援朝的政治動員與廣泛的宣傳作用下，伍修權在聯合國的活動獲得中國各界極大的關注與迴響。從代表團出發前往紐約開始，報紙就以顯著版面連續刊載代表團相關消息與圖片，《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多次發表專門社論聲援代表團。伍修權 11 月 28 日在安理會的演講內容，於 30 日在中國各大報頭版全文轉載。當天《人民日報》社論以〈堅決制裁美國侵略臺灣的罪行〉為題，完整闡述北京對臺灣與朝鮮問題的立場，將美軍占領臺灣、侵略朝鮮、逼近中國邊界、侵犯中國東北領空與轟炸中國邊境城鎮的行動，視為美國侵略中國計畫的具體展現，聯合國如不能制止美國、負起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則將信譽掃地。[151]

為配合代表團在紐約的鬥爭與三視運動的目標，北京組織作者撰寫一系列揭露美帝侵華歷史的文章與社論，連續發表於《人民日報》；並動員各種社會組織以召開記者會、發表聯名宣言等形式，聲援北京代表

General Wu's Statement," *The Times*, December 21, 1950, p. 4.

149 〈伍修權代表等一行返抵北京　郭沫若致歡迎詞　伍修權致答詞　一致指出和平民主陣營一定能夠壓倒侵略陣營〉，《人民日報》，1950 年 12 月 31 日，第 1 版。

150 伍修權自述，楊永富編輯，《伍修權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頁 193。

151 〈堅決制裁美國侵略臺灣的罪行〉，《人民日報》，1950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團。[152]同時，這個控訴案也配合韓戰，成為實施愛國教育與政治動員的重要題材，全國各地都展開密集的宣傳工作。例如各地紛紛展開集會、簽名與致電表達對伍修權的支持、對美帝的批判。[153]奧斯丁特別成為眾矢之的，甚至有專門為批判奧斯丁而舉辦的集會，12 月 3 日北京基督教各界舉行「反奧斯丁誣衊示威大遊行」，批評他誇言中美友誼，其實是欺騙世界人民。[154]

（三）北京外交部對代表團在美收到信件的分析

伍修權一行在美期間，代表團共收到美國各界寄來的信件 708 封（含電報，但不包括記者與外國人來信），北京認為這些信件反映美國民意，將其完整帶回中國。外交部國際司深入分析這批信件並作成報告，顯示北京對了解美國、特別是美國人民想法的態度。[155]

外交部的分析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信件發信者散布全美各地，紐約州最多、加州次之，這可能反映地緣因素。[156]發信者除個人外，還有以團體名義、或由多人共同署名，代表信件不僅是個人意見，也反映團體意識，不過工人團體似乎較少。二、發信的時間以伍修權在安理會

152 這包括從 12 月 3 日開始，連續一周安排好作者與主題在《人民日報》發表；〈配合聯合國鬥爭幾項工作的彙報〉，收於《關於向聯合國第五屆大會提出中國代表團名單問題的意見及配合聯合國鬥爭的幾項工作匯報》1950.08.20-12.02，《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105-04，頁 3-5。

153 例如〈北京協和醫學院九百餘師生員工簽名擁護伍修權正義發言　發出通電痛斥奧斯丁無恥讕言〉，《人民日報》，1950 年 12 月 17 日，第 3 版；〈臺盟及青年團中央堅主繼續控訴美帝〉，《人民日報》，1950 年 12 月 6 日，第 1 版。

154 〈北京宗教界以行動回答了奧斯丁〉，《光明日報》（北京），1950 年 12 月 20 日，第 4 版。

155 北京外交部對這些信件的分析內容，見〈外交部對美國群眾致中國出席聯合國特派代表團信件的分析〉1951.05.31，《外交部開放檔案》，113-00040-02。

156 來自紐約州各地的信件就占全數的 30.5%，遠超過其他地區。筆者推測紐約州靠近聯合國總部所在地，市民對北京代表來訪有較多的體認；而加州華裔人口較多，可能也較關切此事。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演講後、安理會討論南韓受到侵略的兩個時段最多，反映美國民眾關注北京代表團的時間焦點。三、各種來信內容，有對北京表示歡迎與稱讚，也有責罵批評；儘管多數發信者不了解共產中國，但都接受北京建政的事實。整體來說，這些信件反映多數美國人的看法：美軍在朝鮮與臺灣的行動，是善盡保護善良人民的職務，而中共是被蘇聯利用而捲入戰爭，這一認知自然與北京有很大不同。

國際司總結這批信件主要表現美國「小資產階級份子」對中國及朝鮮問題的看法，而「進步份子」可能受到美國政府的打壓而不敢來信，只送花到飯店致意。這樣的結論或有些突兀，其實反映意識形態與文化的隔閡，對中美之間，或是共產主義社會與西方式民主社會間，可能會造成的誤解與不同認知。北京透過伍修權代表團雖得以實地接觸西方民意，但仍以既定邏輯解讀相關活動，實際達到的溝通效果有限。

（四）伍修權的感想

伍修權在紐約的表現，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隨即升任外交部副部長。[157] 1951 年初，伍修權與代表團其他成員多次應各單位邀請，進行多場報告，有些地區還專門組織萬人集會，邀請伍修權前往分享與美帝鬥爭的經驗。在他形跡未至的地方，伍在安理會發言的紀錄片與各種報導也成為愛國教育材料傳送。來自各地的熱烈反應使伍修權感受到，中國以全新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已經激起人民的自豪感，眾所矚目。[158]

除了對國內新氣象有所體驗，伍修權也對未來外交工作提出建議。紐約之行對伍修權與北京外交部都是很大的挑戰，最主要的困難是缺少經驗。在行前，伍修權對聯合國議事程序了解很少，對如何與外國官員來往的經驗有限，外交部能提供的幫助並不多，因此他必須邊做邊學，

157 見路透社 1951 年 1 月 7 日發自香港的電文，“General Wu Promoted,” *The Manchester Guardia*, January 8, 1951, p. 8.

158 伍修權自述，楊永富編輯，《伍修權將軍自述》，頁 193-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為人力吃緊的代表團帶來很大壓力。[159]伍修權認為像這樣規模的外交任務，代表團至少要有 15 人以上才比較從容，年輕外交官要有較多的對外活動經驗，以後應付外交工作才有把握。而要從事外交工作，外語與才智都非常重要，他以馬立克為例，指他常能以淵博知識令敵人無以辯駁。[160]

對於美國，伍修權也提出他的觀察。他用他較熟悉的蘇聯與行程中停留的捷克來與美國比較，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擁護政府，凡事政府一號召、人民莫不響應；美國則相反，人民對政府的政策不感興趣，社會渙散、上下層脫節，因此經不起考驗，一旦發生戰爭，必定失敗。[161]伍修權另對蘇聯給予極高評價。從中國代表團啟程以前，蘇聯即提供各方面的協助，包括協調旅行計畫、因應天氣因素造成的耽擱、各種政治外交問題的諮商、協助代轉機密文電等，不一而足。更重要的是，在紐約聯合國議場內外，「維辛斯基和馬立克秘密的照顧我們，使我們很感動」。[162]

結　語

1950 年伍修權的紐約聯合國之行，開啟中國新政權走向世界的序曲。雖然北京的地位在聯合國尚未獲得正式承認，但伍修權在紐約與聯合國受到的注目，實際表現共產中國對世界局勢擁有的影響力。代表團此行痛擊「帝國主義」分子與他們的「傀儡」，用驕傲的態度表現中國

159 伍修權提及代表團翻譯周硯在回程抵達布拉格時，連續睡了 10 幾個小時，可見其疲倦程度。見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80-281。

160 〈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34。

161 〈伍副部長報告紀錄，1951 年 1 月 10 下午 2 時於外交部大禮堂〉，《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37。

162 〈伍副部長報告出席安理會情況，1951 年 1 月 17 日於軍情局〉，《外交部開放檔案》，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漲的革命民族主義情緒，通過在紐約對美帝的鬥爭，興起國內一波波愛國主義與政治動員的高潮。雖然北京的控訴在聯合國最後沒有實質結果，但發揮宣傳效果，確實達到分化西方的政治目標。在聯合國的殿堂上，伍修權不僅向世界展現新中國的面貌與力量，也向所有海內外華人宣示，新政權藉由充滿革命意識的民族主義語言，高調宣揚中共建政的正當性。

這次行動展現中國新政權建立初期，外交政策中具有的革命性格。北京將內戰與革命的思維搬上外交舞台，把外交官化身為文職的解放軍，用戰場上敵我分明的價值觀理解國際形勢，以零和的標準做為外交活動的手段。這種革命性格也表現在外交官個人風格。不同於以往精通英、法語，多是在西方名校取得高級學位的民國外交官，伍修權出身軍旅，以俄語為主要外語，雖有涉外工作經驗，對西方仍相當陌生。[163]基於革命的歷史觀，伍修權將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歷史，簡化為一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又將清末、北洋到國民政府時期以來，中國歷屆政府對外爭取國權的努力一筆勾銷，用「磕頭外交」、「跪在地上辦外交」概括中共建政以前的中國外交經驗。但不論是北京外交部或伍修權對中國近代史與美國的認知，幾乎都是源於內戰敵對的經驗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與實際狀況有一定差距。當意識形態鮮明的政治宣傳話語被認知為歷史事實後，這種革命史觀雖可能使新政權得以凝聚力量、創造認同，但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中共的革命史觀切斷新政權與過往歷史的聯繫，但是這種受政治因素影響的歷史觀往往經不起時間檢驗，常因政局轉變而今是昨非。以伍修權而言，1963 年他再度率領代表團赴柏林參加德國統一社會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第五次代表大會。此時的蘇聯已不是親密友好的老大哥，而是勢難兩立的修正主義敵人。伍修權在

163 美國媒體介紹伍修權常會特別提到他俄語流利，但幾乎不會英文，“Chinese Reds Speaks Softly On Arrival,”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1950, pp. 1-2; “Wu Of China: ‘More General Than Diploma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50, pp. 12,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該次大會批判蘇共、統社黨為反華的修正主義者，其嚴厲一如 1950 年在安理會對美國的批判。[164]這些發展說明北京的革命史觀不但與過往歷史切割，還會因為政治因素而在不同時期出現自我斷裂。

革命的意識形態與歷史觀影響北京與國際社會的相互認知。伍修權批評美國社會散漫、分化，並以此對照、證明共產社會「上下一心」的優越性。同樣的，北京外交部在分析代表團收到的來信，也將社會主義階級對立概念套在美國社會，以此解釋美國民間反對北京的原因。由於對自由主義傳統下的民主與多元社會理念並不熟悉，北京的觀察僅止於表面，評價難稱公允。但相對的，這種文化因素造成的主觀立場也存在於國際社會。西方媒體對代表團活動的詳細報導，顯示西方讀者對北京的好奇，英、印寄望北京走「南斯拉夫路線」的期待，是它們堅持與北京保持來往的重要原因。可以說誤解與猜疑是兩方都遭遇的問題，這種溝通障礙可能只有通過頻繁且深入的互相交流與學習才有機會化解。伍修權此行雖然未竟全功，但其承擔起外交重任，忠實執行上級指令，在摸索與學習中，有節度地完成了此次歷史任務。他不但擴展北京對聯合國與國際政治運作的了解，也為未來北京面對國際挑戰累積重要經驗，這亦是他這趟紐約聯合國之行的重要意義。

* 本文為 102 年國科會計畫「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聯合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案研究」（NSC 102-2410-H-030-006）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群年會」與「第三屆國際關係史工作坊」，感謝與會學者，特別是評論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教授，與《臺大歷史學報》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文章若有疏失，仍由作者承擔文責。

（責任編輯：石昇烜　歐陽宣　校對：洪麗崴）

164 陳弢，〈兄弟鬩牆：中德在 1963 年統社黨六大前後的爭鬥及其影響〉，《德國研究》2015 年第 4 期（上海），頁 121-1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人民日報》（北京），1950 年 10-12 月、2014 年 8 月。
《中央日報》（臺北），1950 年 11-12 月、1951 年 3 月。
《光明日報》（北京），1950 年 12 月。
《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1949 年 10 月-1951 年 12 月）》編委會編，《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匯編（1949 年 10 月-1951 年 12 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網頁，http://www.jb.mil.cn/jszt/jsrw/ghgys/shj/andong/.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開放檔案》。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伍修權自述，楊永富編輯，《伍修權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
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下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二卷（1949.3-1950.7）》。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4。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三卷（1950.8-1951.8）》。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4。
沈志華主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凌　青，《從延安到聯合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聯合國，《聯合國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錄：第一委員會，各次會議簡要紀錄，第二卷，1950.11.14-1951.05.17》。紐約：聯合國，1951。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Archives Unbound: Department of State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Collection.
Chicago Daily Tribune.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1947-1980.
Time: The Weekly News Magazine,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367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Manchester Guardia.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Butler, Roha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II,* Vol. 4: *Korea June 1950 - April 1951*.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Kore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二、近人研究

于化民，〈中美關係史上特殊的一頁——中共領導人與延安美軍觀察組交往始末〉，《東岳論叢》27 卷 4 期，2006 年 7 月，濟南，頁 121-131。

牛 軍，〈新中國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徵〉，《歷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北京，頁 23-42。

牛 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王泰平，《新中國外交 50 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田居儉，〈抗美援朝運動與「三視」教育〉，《高校理論戰線》2000 年第 12 期，北京，頁 19-24。

石功彬，〈外交奇才伍修權〉，《黨史天地》1995 年第 7 期，武漢，頁 26-28。

李同成，〈聯合國專家龔普生〉，收入李同成、蔡再杜主編，《中國外交官在北美、大洋洲》，頁 102-1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沈志華，〈試論 1951 年初中國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的決策〉，《外交評論》2010 年第 4 期，北京，頁 105-126。

翁 明，〈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記伍修權外交生涯片段〉，《外交學院學報》1999 年第 2 期，北京，頁 20-29、97。

陳 弢，〈兄弟鬩牆：中德在 1963 年統社黨六大前後的爭鬥及其影響〉，《德國研究》2015 年第 4 期，上海，頁 121-137。

陳良飛，〈浦山的選擇〉，《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2013 年 5 月 14 日，第 D04 版。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修訂版。

趙褘楠，〈朝鮮戰爭中新中國的重大外交活動〉，《黨史文苑（紀實版）》2010 年第 13 期，南昌，頁 10-16。

盧 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上）〉，《縱橫》1998 年第 8 期，北京，頁 14-20。

盧 弘，〈新中國派赴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下）〉，《縱橫》1998 年第 9 期，北京，頁 33-36。

蕭道中，〈聯合國中的交鋒：1950 年中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5 期，2016 年 6 月，臺北，頁 139-183。

謝顯益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銀勝，《喬冠華傳：紅色外交家的悲喜人生》。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
Zhong, Wenrui. “Military-diplomatic Adventurism: 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1).”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2013.

三、網路資料

聯合國，《聯合國文獻中心》中文網頁，http://www.un.org/zh/documents/ods/.
聯合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文網頁，http://www.un.org/zh/sc/documents/resolutions/1950.shtml.
聯合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https://documents -dds-ny.un.org/doc.
聯合國，《三八四（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鮮事》（A/RES/384(V)），聯合國大會網頁：http://dacces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058/60/IMG/NR005860.pdf?OpenEleme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9 (June 2017), pp.217-263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59.05

New China's First Diplomatic Experience: A PRC Deleg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50

Hsiao, Tao-chung*

Abstract

In August 1950,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sented a complai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t charged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with an invas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and a viol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sovereignty as a result of America's entry into the Taiwan straits and Taiwan Island following the onset of the Korean War.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laced this complaint on its agenda and invited Beijing to send representatives to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s. On November 24, the Beijing delegation led by Wu Xiuquan arrived to New York City.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government that a delegation had attended the U.N. As it reached New York, the Cold War in Asia was approaching its climax.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Army had penetrated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previous month and confronted a large-scale U.N. military action hea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is conflict provoked international concern and Wu's delegation, which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was seen as an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Beijing's intentions in Korea, as well as establish contact with China. Wu's mission was not just to engage diplomatically with the "imperialist" na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to use the platform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broadcast Beijing's message to the world.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o. 510, Zhongzheng Road, Xinzhua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4205, Taiwan (R.O.C.);
E-mail: 059080@mail.fj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is effort constituted the first significant diplomatic action of the new Chinese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Wu Xiuquan's first diplomatic venture "deep into enemy territory." The episode offers a glimpse into the character of early Communist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and the manner it expressed the world view of the people of New China.

Keywords: Cold War, United Nations, Complaint of armed invasion of Taiwan (Formosa), Korean War, Wu Xiuqu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